

丛书主编 马瑞芳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 传播研究

王平 等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丛书主编 马瑞芳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 传播研究

王平 等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播研究/王平等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马瑞芳主编)

ISBN 978-7-5328-9085-9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
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5233号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马瑞芳 主编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播研究

王 平 等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mm×1000mm 16 开本

印 张: 27.75 印张

字 数: 38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9085-9

定 价: 8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659



总 序

2005年我担任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后,考虑到学科自身优势和发展需要,拟组织本学科教授撰写一套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对此选题很感兴趣,并申报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重点项目,获得批准。我们特别邀请山东师范大学王恒展教授加盟。历经十年,这套丛书的九部书稿终于集体亮相于读者面前。

为什么选择撰写这样一套丛书?因为此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史”“论”,侧重于思想艺术分析,对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文体,如何萌芽、产生、发展、壮大,直到蔚为大观,对各类小说的发展过程、阶段、特点,研究得似乎还不太够。有必要采用多角度、多侧面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做一下梳理和开掘,总结出一些可以称之为规律性或中国特色的东西。

那么,这套丛书涉及并试图总结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哪些规律和特色?

一曰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范围、分类。今存文献中,“小说”这个词语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论》: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①小说研究者早就认识到这里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论，指与“大达”形成对比的小道，还不具备文体“小说”的含义。小说在汉代之前尚缺乏独立的文体意义。在漫长的文学发展长河中，随着小说题材的拓展和小说创作艺术的渐渐成熟，“小说”才成为以散文叙述虚构故事的文学体裁的专称。中国古代“小说”一词内涵、外延都相当复杂，既有文学性文体部分又有非文学性文体部分。各朝各代学者对小说做出了各种分类。16世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后三类就属于非文学性文体。后世学者对文学性小说文体的分类通常按语言形式做文言和白话之分；按篇幅做长篇和短篇之分（中篇小说通常被包含在短篇小说之内）；按内容做志怪和传奇之分，还有更具体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人情小说之分……不一而足。本丛书着眼于文学性文体小说的研究和分门别类的细致考察。

二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孕育、滋养过程。考察哪些文体、哪些因素对小说的产生起作用，这一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先秦两汉语言文学中。先秦两汉并没有产生典型的小说文体，但此时的多种文体如神话传说、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甚至《诗经》《楚辞》都给小说的产生以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影响。其中，神话的原型人物、典故、构思，史传文学的叙事笔法和杂史杂传，诸子中的“说体”故事和寓言故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起到决定性作用。本丛书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做了全面深入探讨，提出一系列新见解。如庄子对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决定性影响，《诗经》《楚辞》对小说创作的开宗作祖意义等。

三曰中国古代小说唐前史料学探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是基础，是理清小说产生年代、成就、特点的必备资料，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前提。汉前小说史料依附于历史、诸子，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跻身于众多文体之中，产生大量小说作品。程毅中先生在《古代小说史料简论》一书中提出：小说作品本身和版本、目录、作者

^①《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1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生平、评论等,都是重要的小说史料。本丛书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各种发展阶段的重要作品进行探究时,注重考证,注重重要作家生平对小说创作影响的考察,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剖析,力求“言必有据”“知人论事”。需要说明的是,唐后小说史料十分繁富,由于小说是“小道”的观念,唐后一些极其重要的作家如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的生平往往不易弄清。因而对作家生平的考订应该成为小说史料学的重要内容,如与红学并列的曹学,就是专门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祖辈的学问。而用一本书探讨整部小说史史料问题几乎不可能,故本丛书对唐后小说史料的必要性、兼顾性研究体现在有关书中,小说史料的专门性探究暂时截止于唐前,唐后小说史料的专门性探究,留待此后有条件时增补。

四曰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轨迹和写作特点。中国古代两类最主要的小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经历了萌芽、成长、繁荣、鼎盛、衰落阶段,并在各阶段产生了彪炳史册的名著。我们采用通常意义的文言和白话区分法,其实严格地说,不能用“文言或白话”截然区分中国古代许多小说,典雅的《聊斋志异》里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通俗的《金瓶梅》中也出现台阁对话,《三国演义》则采用既非纯粹文言亦非纯粹白话的浅显文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唐传奇、《聊斋志异》等,具有明显诗化和写意性特点,人物描写带一定类型化、“扁平”性,故事叙述、情节结构较为简约明快。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不管是短篇小说《三言二拍》,还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重在描写情节完整、曲折生动、感人悦人的故事,或着眼悲欢离合,或着眼社会问题,人物栩栩如生,风貌复杂多样,长篇小说更具有一定的史诗品格。文言小说以志怪成就最著,白话小说描写人生成就最高。不管文言还是白话小说,在人物描写、情节布局、构思艺术上,在诗意化和寓意性上,既借重于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学其他样式如诗词辞赋散文戏剧,小说之志怪和传奇、文言与白话,又互相融汇、互相补充、互相借鉴,共同构成中国小说特有的人物创造、构思方法、描写格局、民族特点。



五曰对小说民俗的选择性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特点。因为中国古代小说所反映的民俗太复杂,涉及面太广,时间跨度太大,难以专门用一本书进行既细致又全面的研究。本丛书在剖析中国小说发展若干问题时,顺带对小说中的民俗进行综合考究,并选择跟山东有明确关系的几部名著如《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对小说所反映的民间信仰、饮食服饰、祭祀占卜、婚嫁丧葬、灵魂狐妖迷信、神佛道观念……进行专门考察,研究这些人生礼俗对刻画人物、组织情节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与汉族民俗的对照,选择《红楼梦》作为满族民俗的载体进行研究。除与汉族类似的饮食服饰、神佛观念外,侧重考察《红楼梦》反映的满族游艺习俗、骑射教育以及满族的蓄奴风俗和与汉族不同的姑娘为尊的重女风俗。通过这个新角度对几部古代小说名著的解读,说明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中表现的民族风俗是其他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都不能替代的。

六曰对小说传播的选择性考察。文言小说的主要传播途径不外乎史家和目录家的著录、读者传抄、类书和丛书收录、戏剧改编。白话小说的传播途径要广泛得多,在传播上也更有代表性和广泛性。印刷取代传抄成为主要传播方式,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修髯子、刻印《水浒传》的武定侯郭勋等是小说印刷传播先驱。书坊为降低成本、扩大印刷推出的“简本”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选本如《今古奇观》,成为推动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大夫成为白话小说的重要接受和传播者,“评点”变成自娱悦人兼推动小说销售的手段,白话小说改编成戏曲也很多见,三国戏、水浒戏、西游戏、封神戏、杨家将戏等广受欢迎。而与广泛传播形成强烈对比、引起尖锐矛盾的是统治者的“禁毁”。其实,中国古代小说很早就传播到欧洲引起世界文豪的赞誉。《歌德谈话录》多次谈到在中国只能算做二流的小说《好逑传》《玉娇梨》等,歌德说:在他们(中国人)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对中国古代几部二流小说跟《红与黑》等欧美名著持类似欣赏态度。拉美文学两



位当代文学巨匠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都崇拜曹雪芹和蒲松龄，博尔赫斯曾给阿根廷版《聊斋志异》写序并大加赞扬。

七曰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研究。刘勰《文心雕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偏偏没有关于小说的内容，这固然因为当时小说还处于萌芽时期，也说明小说从产生伊始，就没法取得与传统文学如诗词散文平起平坐的地位。小说被列入“子”部，算做“杂家”。“小说”者，小家珍说，雕虫小技也。小说长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笼罩下，小说家总想羽翼信史、向历史学家靠拢，蒲松龄自称“异史氏”，就是司马迁“太史公”的模仿秀。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系统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理论常以序跋或评点形式依附于小说本身，主要起诱导和愉悦读者的作用，不像经学家说经，诗词学家说诗词，起到写作指导作用。因此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常是“捎带性”的副产品，且多需后世学者加以进一步综合阐释。古代小说理论极力与散文理论、史传文学理论相对接，以取得合法性，其核心理念、内在思路、观念表述多借鉴经史理论，特别是“文以载道”“良史之才”等观念经常被运用。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古代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具体人物、情节东鳞西爪的评点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部分吉光片羽的观点甚至可与20世纪文论家媲美。

八曰中国古代小说构思特点。中国古代小说从萌芽到繁荣，经历两千多年，无数作家付出辛勤劳动，它们形成了哪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思方法？哪位作家是哪类构思方式的开创者？哪位作家是哪类构思的集大成者？这些构思方法是如何萌芽、成长，并长成一株株小说名作的参天大树？这些形态各异的参天大树又如何共居华夏一园，形成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千姿百态、摇曳生风的美景？……

这套丛书的写作目的，既想尽古代文学研究者职责，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拓出新路子，完成新命题，又想古为今用、研以致用，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的比较全面的检视，使得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学概念、理论在纸面上接轨、“比武”，让辉煌的古代小说以崭新如新的面貌走向读者，走向世界，引导当代读者阅读，给当代小说创作



者参考。

因为文出众手,每位作者都是此方面默默耕耘多年的专家,各有自认为必须说明之处,故可能本丛书对某些话题和观念,如“小说”词语的历史演变,或有重复涉及,乃或有此书与彼书抵牾之处,读者方家慧眼鉴识之。

古代文化典籍版本复杂,本丛书择善而从,所引用经、史、诗词、小说原文,基本采用权威通行本并在页下加以详注。

众擎群举,十年搏书,敬请读者方家指点。

马瑞芳

2015年6月12日于山东大学



绪 论

古代白话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被接受者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与诗文等文学样式的创作相比,小说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接受者在进行创作,因此其传播接受便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尤其是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了一批颇具艺术生命力的优秀作品,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传播的迅速发展与进步。按照传播学的理论,传播由传播环境、传播媒介、传播接受及传播效果等几大要素组成。不难看出,明清时期这几大要素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 20 世纪以来,上述几个要素的变化更加明显。对这些变化进行细致分析,总结出其基本特征,可以更全面地把握古代通俗小说广为流传的原因,并能寻找出小说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

一、明代以前白话小说传播的基本情况

古代白话小说的产生远远晚于文言小说。明代以前,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有着不同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文言小说的传播途径不外以下几种:一是史家和目录学家的著录,二是读者本人的传抄,三是类书、丛书的收录,四是改编为戏曲。直到宋元,才开始有少数作品被刊印



传播。

史家和目录学家对文言小说的著录开始于《汉书·艺文志》，《汉志》“诸子略·小说家”中著录了《伊尹说》等十五种小说，可惜已全部亡佚。在“数术略·形法家”中著录了《山海经》十三篇，今存。自《隋书·经籍志》之后，历代史书著录的小说日益增多。如《隋志》“史部地理类”有郭璞注《山海经》二十三卷、《神异经》一卷、《十洲记》一卷，“史部起居注类”有《穆天子传》六卷，“子部小说家类”有《燕丹子》一卷、《博物志》十卷、《世说新语》八卷，“史部旧事类”有《汉武帝故事》二卷，“史部杂传类”有《汉武洞冥记》一卷、《搜神记》三十卷、《搜神后记》十卷、《冤魂志》三卷等等。新、旧《唐书·艺文志》则分别著录了《冥报记》《补江总白猿传》《定命论》《灵怪集》《玄怪录》等一批唐代小说。

目录学家对小说的著录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开始。如作于战国时期、后已失传的《方士传》，两书便分别做了著录并有简要的说明。后来的私人藏书目录也著录了不少小说，如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两书除了著录小说名目之外，还常常对小说的有关情况做些说明。如在著录了《补江总白猿传》后，陈振孙说道：“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类猕猴，盖尝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①可惜的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只著录了小说的名目，虽然能够引起人们一定的关注，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直接使这些小说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

在明代之前，各种类书、丛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说郛》等则直接收录了许多文言小说作品，尤其是《太平广记》收录了大量文言小说，《四库全书》称其：“所采书三百四十五种，古来轶闻琐事、僻筴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②如唐传奇名篇《莺莺传》《柳毅传》都首先见于其中。这对于文言小说的传播当然更为有利，许多文言小说作品就是赖其收入而得以流传至今。但是这些类书卷帙浩繁，绝非一般读者所能问津，因而仍是有限度地在进行小说的传播。

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一，武英殿聚珍本。

②〔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第1212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



除了史家、目录学家及类书、丛书之外,一些感兴趣的读者也成为文言小说的传播者。《世说新语·文学篇》有这样一条记载:“裴郎(指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①这种情形当不是偶然,读者的竞相传抄,使文言小说作品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但传抄者毕竟是少数作品和少数人,还不能形成更广泛的传播。

将小说改编为戏曲是文言小说传播的方式之一,许多优秀的唐传奇小说都曾被改编为宋元戏文或元杂剧,如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崔护谒浆》、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及元代戏文《王仙客》《柳毅洞庭龙女》等。根据六朝时期小说改编的戏曲也为数不少,如关汉卿的《终南山管宁割席》、王仲文的《感天地王祥卧冰》、宫天挺的《死生交范张鸡黍》及无名氏的元代戏文《王月英月下留鞋》《王祥卧冰》《汉武帝洞冥记》等。

从唐代以来,白话通俗小说开始出现,“说话”和“俗讲”成为主要的传播形式。如唐代著名的“一枝花话”就是以“说话”的形式在文人间流传着。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自注云:“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②唐代寺院中的“俗讲”所讲说的“变文”,实际上也是“说话”的一种形式,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本》《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等等。这种“说话”甚至传入了宫廷之内,郭湜《高力士外传》载:“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埽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③

“说话”这一伎艺在宋元时期得到了发展,更多的是在勾栏瓦肆中进行,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条、耐得翁《都城纪胜》“瓦市”条、罗烨《醉翁谈录》及《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等,都

①〔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唐〕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唐〕郭湜:《高力士外传》,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有或详或略的记载。如后者说：“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小说，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英、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①这种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虽然比唐代的传播范围更广，但依然是一种人际传播，仍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开始出现了话本小说的刊本。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上、中、下三卷，宋刊巾箱本，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题款。王国维认为这个“中瓦子”就是南宋临安府一条街名，“张家”即“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②可见这位张官人不仅印书，还兼销售。再如宋人旧编、元人增益并刊行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胡士莹先生认为“书标‘新编’字样，盖刊印时书贾用以号召耳”^③。这就是说，书商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量，已经注意到在书名上做些文章。

更值得一提的是元人编刊的《全相平话五种》，每一种都分上下两栏，上图下文，图约占三分之一。其中《三国志平话》图最多，有七十幅，《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图虽最少，但也有三十七幅。这种编印形式显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需要，尽可能地增加销量。从《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这一书名上还可以得知，此书颇受读者欢迎，以至于书商要再次刊印。但是，就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书籍的刻印，尤其是小说的刻印，规模还不是太大。

二、古代白话小说传播方式的基本特征

进入明中叶之后，白话小说传播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印刷品取代传抄和讲说而成为小说的主要传播方式。当然这种转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取决于造纸业、印刷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接受者的购买力。转变之初，是一些对白话小说感兴趣的文人士

①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见周峰点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108～10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② 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1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7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大夫,将几部原来仅靠传抄而又有较大影响的白话小说付梓。曾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修髯子”张尚德就是其中的一位。该本前有“庸愚子”蒋大器弘治甲寅年(1494)序,序中说道:“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①这表明在弘治年间《三国志演义》还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一部百万言的白话小说仅靠抄本传播,其范围当然极为有限,正如张尚德在“引”中所说“简帙浩瀚,善本甚艰”。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请寿诸梓,公之四方”^②。从此以后,各种版本的《三国志演义》不断出现,粗略统计,现存的明代刊本有三十余种,清刊本有七十余种。

嘉靖年间的武定侯郭勋也是一位喜爱小说的贵族文人,“天都外臣”在明万历己丑年的《水浒传序》中说道:“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③既言“重刻”,则在此之前肯定还有其他版本。但万历间袁无涯称:“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④这说明,早在万历年间,所谓“古本”《水浒传》已失传,郭本《水浒传》则被视为“旧本”,而且当时的人们已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道:“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⑤不仅有郭本的复刻本,其他各种本子也不断出现。胡应麟曾说道:“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能覆瓿。复数十

① [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6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② [明]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7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③ [明]天都外臣:《水浒传序》,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313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④ [明]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327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⑤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33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书于元明之际,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在经过一百余年后,两书才有了刻本。自《西游记》之后,情况不同了。尽管学术界对《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尚有疑问,但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之前,还不宜推翻此说。而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西游记》的完整刻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世德堂本,此时距吴承恩去世不过十几年。《金瓶梅》也是如此,袁宏道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与董思白书》,是有关该书流传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记载,可以推知,此时距《金瓶梅》成书不会太久。我们今天见到的《金瓶梅词话》本,前有“东吴弄珠客”写于万历丁巳年(1617)的序,其间相距也不过二十余年。至于余邵鱼撰的《列国志传》、冯梦龙撰的《新列国志》、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等大量的明清小说,几乎都是写完之后立即刻印。

当然以抄本形式传播的情况也还存在,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书商对该书能否赢利没有把握,二是著者本人无意或无力将其付梓。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必然要影响该书的传播,甚至会使其失传或亡佚。明人甄伟在为《西汉通俗演义》作序时便指出:“书成,识者争相传录,不便观览。”^②但有了刻本之后,便迅速传播开来。《儒林外史》开始也是先有抄本流传,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曾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③但抄本毕竟流传有限。据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称:“惟是书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④这就是说,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了刻本,此后又有嘉庆八年(1803年)、二十一年(1816年)及同治十三年(1874年)等刻本。刻本问世后,此书才迅速流传开来。不仅《儒林外史》等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第43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② [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1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③ [清]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本先生传》,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902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④ [清]金和:《儒林外史跋》,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917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一流小说如此,就连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也是一印再印,如《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仅“书业堂”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十三年(1778年)和四十四年(1779年)接连刻印三次。而像《歧路灯》《姑妄言》等小说则因无人刻印,所知者甚少,几乎湮灭。

其次,为了满足传播接受者的需要,或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书坊推出了各种形式的版本。如《三国演义》周曰校、夏振宇刊本都标明为“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本,以“古本大字音释”吸引读者。郑以桢刊本标明为“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本,又增加了“京本”“圈点”。余氏双峰堂刊本为“新刻按鉴全像批评”本,进一步增加了图像和批评,每一页上面为评,中间为图,下面为文。熊清波刊本为“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本,将图像插在了书中。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刊本为“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本,每页是上图下文。崇祯间雄飞馆又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合刻为《英雄谱》本,上为《水浒传》,下为《三国演义》。直至清代毛宗岗本出现后,仍有书商在书名上做文章,如现藏于英国博物院的“绣像第一才子书”,实际上就是毛本《三国演义》的坊刻本。^①

明代中叶尽管造纸、印刷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一部小说的价格依然较高。^②万历时一部二十余万字的《春秋列国志》定价为一两白银,而当时一亩地也不过值二两白银。虽然白话小说被称为通俗小说,但这种价位并非一般读者所能问津。为了降低书的成本,以扩大销量,书坊又推出了所谓的“简本”。前引明人胡应麟所说的那段话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所谓“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显然是为了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人周亮工曾说:“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指《水浒传》)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③周亮工特别指出“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建阳是明清时期书坊密集的地区,书坊之间有着

①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三十二)〈绣像第一才子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② 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267~26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③ [清]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见朱一玄《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第6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激烈的竞争。“节缩纸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降低成本,“求其易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简本虽然降低了书价,便于读者购买,却是以牺牲原作为代价的,因此,这种方式并不可取。

长篇白话小说以“简本”的方法来扩大销售,短篇白话小说则采用“选本”或分类编排的方法来吸引读者。明末“姑苏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选出四十篇作品辑为《今古奇观》,果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为该书作序的“笑花主人”说,“三言”“二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余拟拔其尤百回,重加绣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先得我心,选刻四十种,名为《今古奇观》”^①。这部选本后来流行极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三言”“二拍”中的许多故事是靠其在社会上传播着。当然,有些选编者按照自己的兴趣对原作随意删改,客观上不利于小说的传播,如王金范选刻的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就是如此,这大概也是这一版本没有得到广泛流传的原因。

三、古代白话小说传播者的基本特征

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刻印、经营各类图书的书坊,这些书坊类似于今天的出版社,对于白话小说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小说书坊录》^②辑录,宋元两代的书坊不过三家,明代增至一百三十四家,截至嘉庆年间清代的书坊就有二百家。明代嘉靖年间刻印白话小说的书坊还不是太多,《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刻印者分别是“司礼监”“都察院”和贵族郭勋。到了万历年间,民营书坊数量激增。如周曰校的“万卷楼”万历年间便刻印了《国色天香》《三国志演义》《百家公案》《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五六种小说。余象斗的“双峰堂”和“三台馆”万历年间刻印了《三国志传》、《北宋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仙出处东游记》、《忠义水浒传评林》、《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水浒全传》、《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唐书志传》、《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等近二十种白话小说。

① [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105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

② 韩锡铎、王清原编纂:《小说书坊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